

馬禮遜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西傳

楊慧玲*

馬禮遜，一位在中國基督教史上有着深遠影響的傳教士和學者，他對宗教的開拓之功已經廣為人所知，然而他促進中國語言和文化西傳的事蹟和貢獻往往被人忽略。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梳理馬禮遜傳播中國語言與文化的事蹟：首先論述他與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的關係，這有助於理解馬禮遜在華事業的起點和終點；其次透析馬禮遜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態度和觀點；最後通過對馬禮遜最具代表性的語言著作《漢英字典》的分析，評述他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

前言

繼明末耶穌會士入華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1807年馬禮遜的入華。他對新教在華事業的創立之功及其為日後新教繁榮局面所奠定的基礎為他贏得了聲譽。在歐美大陸，馬禮遜是一個與利瑪竇齊名的重要人物。然而，在中國，利瑪竇和法國耶穌會士活躍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並且在中西交流史上曾經留下了顯赫的一頁；相形之下，馬禮遜的貢獻則鮮為人知。作為一個繼法國耶穌會士入華後最為重要的承前啟後的歷史人物，一個對基督教史有着深遠影響的傳教士和學者，馬禮遜值得引起國人注意，應從不同角度對他進行研究和進行評價。筆者擬從中國語言和文化西傳的角度，從一個側面來梳理馬禮遜在19世紀早期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貢獻。

當馬禮遜1834年去世時，在他的墓碑上紀錄了馬禮遜在中國工作長達二十七年、編撰和出版世界上第一部漢英辭典、創辦麻六甲英華書院和翻譯出版中文聖經等卓越功績。1843年，在華的外僑於澳門馬禮遜的墓前又立了一個中文石碑，碑上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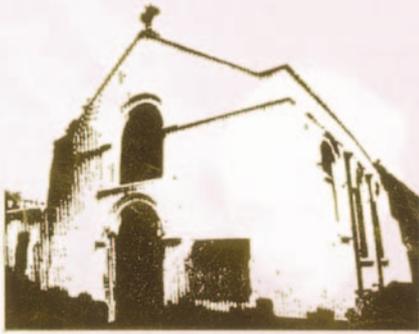
“嘗聞天地間有萬世不朽之人，端賴其人有萬世不朽之言行。如我英國之羅伯·馬禮遜者，乃萬世不朽之人也。當其於壯年來中國時，勤學力行，以致中華之語言文字，無不精通。迨學成之日，又以所得於己者作為《華英字典》等書，使後之習華文漢語者，皆得借為津梁，力半功倍。故英人仰慕其學不厭、教不倦之心，悉頌為英國賢士。由此不忘其惠，立碑以志之曰……”⁽¹⁾由此可見，在馬禮遜時代，當時的外僑及友人對他的語言學成績評價尤高，其中又以漢英詞典的編撰和其它旨在幫助外國人更有效地學習漢語的書為他在英國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因此，從馬禮遜的語言著作和影響入手，梳理作為學者的馬禮遜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並對他作出初步的評價應是有意義的。

馬禮遜與東印度澳門公司

很多人一定會很奇怪，為什麼將馬禮遜與東印度澳門公司的關係看得如此重要？事實上，從馬禮遜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就和東印度澳門公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東印度公司對傳教士並不友

*楊慧玲，女青年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語言學碩士（2005年），現任揚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講師，為澳門世界漢語教育史協會理事。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dedication of the Macau Protestant Chapel, and
 The 19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澳門基督教聖堂重建後祝聖七十五週年暨基督教來華一百九十週年紀念
 75o Aniversário da Reconstrução da Capela Protestante de Macau e
 o 190o Aniversário do Nascimento do Movimento do Missionário Protestante na China.



Macau Protestant Chapel - Camoes Square, Macau 澳門基督教聖堂 - 澳門白鴿巢前地



**澳門基督教聖堂
 萬國禱告之殿。**

澳門基督教聖堂乃基督教在中國境內第一所教堂。它於十九世紀初建成，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杜培主教於一九二零年代重建聖堂，並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為新堂舉行祝聖禮。此聖堂由一九四零年起已被廣稱為“馬禮遜紀念聖堂”，藉此紀念基督教第一位傳教士於一八零七年九月四日開始來華傳教。普世聖公宗第一位女牧師李添嫻牧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此聖堂服務，牧養在澳的難民。本堂乃各地來澳定居的信徒團契及崇拜聚會之聖所，並繼續開來，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共融之印証及耶穌基督在此地方臨在之標誌。

設計：潘乃昭牧師 陳志君先生
 發行：聖公會馬禮遜堂堂務促進委員會
 發行日期：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
 發行數量：壹萬個

Nº 002423

**Macau Protestant Chapel
 A House of Prayer for all Nations**

Macau Protestant Chapel was the first to be built on Chinese soil, and was erect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t became popularly known as "Morrison Chapel" in the 1940's after the name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reach these shores on September 4th 1807. The Chapel was rebuilt and consecrated by Bishop C.R. Duppy, sixth Bishop of Victoria, on January 8th, 1922. Notably, it also served as a sanctuary for victim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der the care of Reverend Florence Li, who was the first ever Anglican woman Priest to be ordained. The Chapel is a house of prayer for visitors from all nations, and still remains a focal point for the ministry and worship of an active Christian community. It continues to symbolize the presence of Jesus Christ in this God's green acre where "East meets West".

Designed by : Revd Dr Michael Poon
 Mr. Eric Chan
 Issued by : Morrison Chapel Council
 Date of issue : June 12, 1997
 Number of copies issued : 10,000

**A Capela Protestante de Macau
 Uma Casa da Oração para todas as Nações**

A Capela Protestante de Macau foi construída no princípio do século XIX e foi a primeira a ser erigida em solo chinês. Tornou-se conhecida entre a população como "Morrison Chapel", ou Capela de Morrison, nos anos quarenta, adoptando o nome do primeiro missionário protestante a atingir estas costas, em 4 de Setembro de 1807. A Capela foi reconstruída e consagrada ao Bispo C. R. Duppy, sexto Bispo de Victoria, em 8 de Janeiro de 1922. Notavelmente, serviu também de santuário para as vítimas da Segunda Grande Guerra Mundial, sob a custódia da Reverenda Florence Li, que foi a primeira mulher a ser ordenada como sacerdote anglicana. A Capela é uma casa de oração para visitantes de todas as nações, e ainda permanece como o centro fulcral de ministério e veneração de uma comunidade cristã activa. Continua, pois, a simbolizar a presença de Jesus Cristo neste acre verde de Deus, onde o "Oriente encontra o Ocidente".

O design da sobrescrito :Pe. Dr. Michael Poon
 e carimbo Sr. Eric Chan
 Entidade da emissão : Conselho de Capela
 Morrison de SKH
 Data da emissão : 12 de Junho de 1997
 Quantidade da emissão : 10,000

好，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千方百計阻撓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對馬禮遜開始也不例外。但是，馬禮遜出色的語言天賦使得東印度公司不得不聘用他為公司擔任翻譯，但在1815年又正式將馬禮遜解職，將他從公司名冊上除名。東印度公司開除馬禮遜是因為馬禮遜在中國印刷和出版宗教書和其它材料，並且在中國散播那些材料。這些都是違反中國法令的事情，違法者將被斬頭。這些宗教印刷品可能會給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造成不良影響，他們把作為公司職員的馬禮遜解職，以便和他脫離正式的關係。東印度公司從未懷疑過馬禮遜的天份、行為和性格，並且清楚地知道公司從馬禮遜的服務中受益。有鑒於此，東印度公司給馬禮遜4,000圓作為補償，讓他個人繼續為澳門公司服務，一直到1834年7月19日澳門東印度公司解散。馬禮遜在澳門公司解散後的幾天後就去世了。所以，要總結馬禮遜所取得的成就，除了他個人所具有的優秀品質和勤奮努力之外，也必須要瞭解他和東印度澳門公司之間的關係。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次派商船直接到達廣州。隨着對華貿易的增長，次年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商館，派出“大班”管理中英往來商務，英國對華貿易從此迅速發展，中國與英國的貿易到18世紀已經佔據中國外貿之首。在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通過“公行”貫徹政府外貿政令並管理外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官府不直接與外國人打交道。因此導致行商和通事的興盛，他們往來於中國政府和英國商人之間，從中謀取利益。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進一步閉關，撤銷漳州、寧波和雲臺三個口岸及海關，僅保留廣州口岸，並特許廣州十三行行商統一經營全國對外貿易，在西關的珠江北岸設立夷館，規定為外商辦理商務及居留之地。英國人對這個政策頗為不滿，東印度公司職員和通事洪仁輝(James Flint)駕船北上到寧波，被寧波官員阻擋後又直入天津，向清廷上書控訴廣東海關貪污勒索。雖然清廷處理了當事的官員免除了一些非法勒索的項目，但洪仁輝也違反

了中國規定，因而被關押三年然後驅逐出境。清政府調查事件後，認為“細查根源縱由內地奸民教唆引誘、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遠處海外，本與中國語言不同，向之來廣貿販，惟藉諳曉夷語之行商通事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至漢字文義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輝之通曉語文言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熟悉？如奸民劉亞扁，始則教授夷人讀書圖謀財務，繼則主謀唆訟代作控詞，由此類推，將無在不可以勾結教誘，實於地方大有關係。”⁽²⁾ 自此清廷更加強了對外商的防範和管理，並於1759年頒佈了〈防範外夷規條〉，規定：1) 外商祇能每年5-10月在廣州居留貿易，期滿必須隨船回國，或去澳門；2) 外商到華祇准住在行商館內，由行商負責管理和監督；3) 華商不得向外商借錢，外商任用華人祇限於通事和買辦；4) 外商不得僱人傳遞信件到內地；5) 加強河流和海防，監視外國船隻的行動。洪仁輝事件對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的漢語學習造成了很大影響，不再有人願意冒這麼大的風險去學習漢語。於是，中英貿易完全依賴行商和通事，顯然使他們倍感不便。直至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出使北京代表英國利益與清廷就中英貿易進行交涉時，在英國竟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當漢語譯員。英國後來不得不到拿波里中文學院(The Chinese College in Naples)尋找譯員，在19世紀的歐洲，那裡也許是唯一能夠找到華人(尤其是受過西方教育的華人)的地方。意識到語言問題後，英國使團成員也試圖學習漢語，但祇有小喬治斯坦東的漢語學習大見成效，在覬見乾隆皇帝的時候能夠回答簡單的問題，受到乾隆皇帝的獎賞。巴羅(John Barrow)雖然很努力，但沒能掌握這門語言，然而他一直積極贊助並試圖推動在英國的漢語學習。直到1803年馬禮遜準備學習漢語的時候，在英國可能仍然祇有小喬治斯坦東懂這門語言。馬禮遜後來成為倫敦第一位教授漢語課的英國老師，並且從1807年馬禮遜到廣東後，英國漢學才開始了歷史上的第一次繁盛時期。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馬禮遜為學習漢語所須克服的困難和最終取得的成績。馬禮遜刻苦學習漢語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倫敦會讓他以此為目的之一，也有他個人自覺和興趣在其中。早在1804年9月，馬禮遜得知將被派往中國去傳道，他就已經開始將精力放在學習漢語上。在他臨行前，倫敦會又一次指示：“在你沒有學會漢語之前，對於你在廣東沒有任何其餘的目標。如果可能，你學會漢語，你立即開始做對世界都有益的事情：或許你能夠有幸編一部漢語字典，比任何現存的都更為全面和準確；或者更榮幸的是把聖經譯成世界三分之一的種族的語言……”⁽³⁾於是，馬禮遜懷着堅定的宗教信念和熱誠，於1807年1月31日（嘉慶十二年）從倫敦出發，取道紐約、南美洲經太平洋到達澳門，並於當年9月7日到達廣州。

馬禮遜來到中國時，清政府一般不允許歐洲人在華居住，也不允許外國人購買和閱讀中文書，如果發現有華人教洋人漢語，即論罪處死。而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商業利益考慮，不願意當地政府為了傳教士而給他們帶來麻煩。馬禮遜1806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也寫到了倫敦會向東印度公司申請搭乘英國船到中國去似未被批准，他不得不取道美國輾轉到廣州。到達澳門和廣州後憑藉一些英國的介紹信，馬禮遜見到了斯坦東、羅伯茨（英商大班）等東印度公司的重要人物。他們提醒馬禮遜在中國學習漢語和居住的危險和困難，也告訴他東印度公司的規定：除了英國商人，不許任何英國人在澳門居住。然而，他們還是以個人名義為馬禮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斯坦東為他聘請了一位中文老師 Abel Yun——一個從北京來廣東打理教會商務的天主教徒，能說流利的拉丁語。另一位秀才李先生，他曾經在葡萄牙耶穌會大學學習過，他的兒子也在教授馬禮遜廣州話。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的人對馬禮遜非常關心，馬禮遜日記還提到他們不僅對他友善，公司的皮爾遜醫生一直照顧馬禮遜的健康狀況，在馬禮遜剛到廣州身體堪憂的情況下，讓馬禮

遜搬到了澳門居住以恢復健康，後來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始終照顧他及其後來家人的健康；公司的其他人如埃菲斯送給馬禮遜拉漢辭典、鮑爾贈送西班牙文的漢語語法書等學習工具書，對馬禮遜的漢語學習幫助很大。早在1808年，羅伯茨大班就告訴馬禮遜他們可以資助辭典的編撰和出版，並且付了馬禮遜在澳門和廣州的租金，為馬禮遜在澳門休養身體和學習漢語提供條件。就在1808年底和1809年初，馬禮遜已經決定離開中國到檳榔嶼的時候，東印度公司正式聘請馬禮遜出任公司譯員，年薪500英鎊，而且是在馬禮遜的婚禮上宣佈的。這完全改變了馬禮遜在中國的艱困處境，使他對1809年2月20日這個特別的日子終身難忘。

倫敦董事會也感謝並且讚同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給他最重要的幫助，也同意他擔任東印度公司譯員。從此，馬禮遜變得更加忙碌，他感到在忠誠地為公司服務的同時不影響他的第一目標——傳教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他除了自己學習、編撰字典、翻譯聖經外，已開始為公司職員教授漢語了，馬禮遜的勤奮和努力可想而知。一直到辭世時為止，他都在為公司的世俗事務和宗教傳播作努力，而且試圖在兩者間尋求一種平衡。當1812年斯坦東爵士因為健康的原因離開中國後，馬禮遜成了澳門公司的唯一譯員，年薪漲了，且可以享受諸如中文教師津貼和辦公室等待遇。東印度公司也因為有了馬禮遜可以直接和清政府交涉、談判，但是對馬禮遜要向中國人傳教則始終持有不同看法，祇是出於敬重馬禮遜的才華和品德，在他不影響為公司服務的基礎上，他們不直接反對。而倫敦傳教會由開始非常支持馬禮遜在公司任職，到1812年轉為擔心他沒有精力為教會事務服務。馬禮遜在給倫敦傳教會的報告中盡量避免談及他的商業和政治活動，以減少倫敦會的擔憂。但在私人信件中，他透露了為東印度公司服務大大阻礙了他的傳教工作。當時的中英貿易和交往極不穩定，正處於風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態下，馬禮遜身處其中，形勢的變化和任務的艱鉅讓



馬禮遜牧師及其翻譯聖經的助手們 錢納利繪

他身心俱疲。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834年7月16日，他和全體公司職員接到英國國王的諭旨和任命書，公司解散了，他接到新的任命，擔任英國駐華首任商務監督律勞卑的中文秘書和翻譯官，穿英國副領事官服，綴英國皇家領扣。馬禮遜立刻接受任命，拖着疲憊之身奔赴廣州，參與和中國政府的談判。他已經不能承受這樣大的壓力了，情緒低落，很想放棄英王的任命，但又不情願草率行事，所以祇能硬撐下去繼續為談判堅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馬禮遜對待漢語學習和中國文化的態度

關於馬禮遜的漢語學習，他的日記裡有大量記載。馬禮遜從1804年開始在英國學習漢語，後來一個在英國學習的中國商人榮三德教授他漢語。榮三

德的漢語不太好，但馬禮遜從他那裡瞭解了漢字的初步知識，並且識記了一定的辭彙量。馬禮遜到達中國後，他得到榮三德的友誼和幫助。馬禮遜還從天主教的手稿漢拉辭典和手稿的漢英聖經中受益匪淺。他到達中國後漢語有了迅速的提高。他在1809年底的報告中寫道：

儘管我在英國就開始學習漢語，現在還在編字典，在我這兩年裡，無論是早晨、中午還是晚上，我都在學習漢語；我現在能給省督寫中文信，他能讀懂我的中文；和幾個高級官員談話，他們也都能明白我的漢語。然而，我對於中國文學的瞭解不完全正確而且比較片面。此外，我還翻譯了大量的官方書信——中國人的兩本基本書——《大學》和《中庸》，以及《論語》的一部分，可我還是要說，我的知識還不夠……您跟我提到

的書我都有，除了他們的儒家典籍、天文、地理、法律、歷史、宗教、解剖、醫藥，還有各種關於語言的書，總數達1,229卷，此外還有一些小冊子。(4)

馬禮遜的漢語學習卓有成效，到中國僅兩年他已能用漢語寫信，還能說官話和當地的方言。

他認為學習漢語是非常重要和實用的。他在《五車韻府》前言中表述了自己對漢語觀：

以前曾有人說，“祇有商人和傳教士才能開拓出一條通往漢語荒野和文學沙漠的路來”，這是極為狹隘的話，也是對漢語一無所知的人的話，對於那些有着更為博愛情感的人而不是僅有狹隘的民族意識或歐洲情結的人來說，他們從來不把這話當真。無須強調，漢語裡有優美的詩詞、有趣和啟迪人的歷史和傳記、重要的道德教誨，就如同其他語言一樣。這還是世界上最為古老和最廣為人知的語言之一；這是由五個地方的人所使用的，構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國度正在使用的語言——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也會對這個主題持其他的態度。……英國、荷蘭、葡萄牙和美國目前與中國來往最多；他們最關注的也是各自的利益。荷蘭政府事實上在爪哇控制着廣泛的中國土地。難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和說這門語言的人有着廣泛的交往的情況下，要求這幾個政府每年投入幾百英鎊支持這門語言的學習，是期望過高的事嗎？對於一個有着數千卷原創文學的語言



馬禮遜紀念堂位於澳門基督教墓園入口。從聖堂大門可見聖堂講臺後上方鑲嵌彩色玻璃大窗上的十字架和“太初有道”圖飾。



來說，在他們的學校裡讓人們知道這門語言的存在也是要求過高的嗎？難道他們的大學自己就不能撥出一部分資金，或者給那些有興趣的人一些鼓勵，要他們學習這門語言？祇有個別的人，他們以文學或科學為業，懷着正確的感情和情結，由他們的政府或知識階層支持，來學習並且教授漢語。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馬禮遜意識到僅學習語言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中國文化。隨着語言知識的增長，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日益加深。從1924-1926年他重返英國和歐洲的公開演講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化所持的態度——

中國人民，上帝賜給他們一個廣闊的疆土，擁有巨大肥沃的土地，良好宜人的氣候，中國人具有許多實用的知識，在生活必需品等方面有足夠的供應。由於有這些條件，中國不要歐洲的任何東西。中國還擁有大量的古代和現代文學，有不要營業執照的印刷所，可以印製廉價的圖書供讀者選購，其中有詩詞、音樂和非常豐富的歷史書籍。……中國對於自然界的理論、各種產品和作物的說明，藥品的鑒定和中醫的歷史和治病的實踐等，也同樣有大量的書籍可以閱讀。因此，中國人對歐洲究竟需要的是甚麼呢？他們不需要歐洲的文學作品，不需要一般性的教育，也不需要歐洲某些慈善家嘮嘮叨叨反復鼓吹的文明。中國需要的乃是基督耶穌的知識，這就是我們的海外傳教會要去傳授的。不管中國人擁有豐富的文學藝術，他們仍然是昏頭昏腦的偶像崇拜

者。……中國雖然擁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國人卻仍充滿着嫉妒、欺詐和撒謊。他們心中充滿了自私、吝惜、精明和冷酷、形而上的無情。以上所述，都是中國人普遍的特性。……中國古代聖賢孔夫子不承認將來有天國的存在，也不承認人們對造物主應有的責任。他對人死後並無任何教訓，對人類思想既不給予恐懼，也不提出任何盼望。他對人的身後既無贊揚也無指責，現在的個人利益是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對在天上的、偉大的、榮耀的上帝和祂創造天地和人類，孔夫子隻字不提。這種無神論的思想，成為中國公眾信仰的基礎，導致中國人產生了極大的驕傲和不敬神，即使他們去迷信偶像也是如此。我相信祇要一個人陷入了無神論或偶像崇拜，祇有用上帝所寫的話，就是基督教聖經的教訓，才能把他們從迷途中找回來，這是顛撲不破的事實。(5)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也因為馬禮遜自身的傳教士身份，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和宗教現象非常關注，並且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優點，但由於不信奉上帝，所以在中國人身上也集中



澳門的馬禮遜墓 C. I. M 1907年，內地會年報。(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全國協進會圖書館，上海。轉引自顧衛民等編著：《使徒足跡——基督宗教傳華全史圖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年。)

着一些極明顯的缺點，祇有基督教和上帝才能拯救中國人的“邪惡”。這一宗教觀點也影響到後來的新教傳教士。

傳播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努力

馬禮遜除了寫日記，在到達中國後還給歐洲教會、親友和學者寫了大量信函。這些信函成為瞭解馬禮遜思想軌迹的重要線索，也成為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特別是有關中國的知識傳播到西方。在他的漢語語法書《通用漢言之法》(1815)和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1815-1823)、其它介紹中國文化的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 Geography, Religion & Customs*

(1817) 等書在歐洲面世時，更是引起歐洲漢學家的注意。法國漢學家雷慕沙 (Jean Pierre-Abel Remusat, 1788-1832) 與馬禮遜就漢語和文化問題進行了多次交流，並且對他所取得的成就非常贊賞。但德國的 Klaproth 對馬禮遜的語言能力大加攻擊。雖然對他懷有不同看法，但歐洲的學者們總體上認可馬禮遜的漢語水平，並且很重視馬禮遜的語言著作。這大大提高了英國漢學在歐洲的地位。

馬禮遜在返英期間，利用他在英國的聲譽巡迴演講，倡議英國人重視漢語學習，並且號召更多優秀的傳教士獻身於中國的傳教事業。不僅如此，他高瞻遠矚地興辦漢語學院，為漢語的學習和研究提供固定場所，1825年6月14日在倫敦成立了語言學院。馬禮遜為學院開設中文課並親自教授了三個月。雖然這個學院僅僅開辦了三年就解散了，但馬



〔歷史照片〕李添嫺牧師 (Revd. Florence Lei Tim-Oi) 與馬禮遜堂的堂議員於 1945 年秋季合照。李添嫺牧師是普世聖公會第一位女牧師。何明華會督因應抗日期間澳門牧養的需要，於 1944 年 1 月 25 日 (聖保羅受感化日) 在廣東省肇慶聖公會按立她為牧師。

禮遜在英國漢學史上也開創了一個第一——第一個在英國教授漢語者。英國漢學也因為有了像馬禮遜這樣傑出的人物甚至在辭典編撰和其它工具書的編寫方面超過了法國漢學，而在此之前，英國的漢學知識則主要來自於法國。馬禮遜還在家中教授幾個有志到中國傳道的年輕人學習漢語，還有幾個婦女，他希望將來能有一個婦女傳教會傳教。除了對公眾進行有關中國文化和宗教狀況的演講之外，馬禮遜還為英國的雜誌撰文介紹中國的情況。1825年馬禮遜並未提出申請就被英國皇家學會選為會員，由此可見他在英國的影響和名望。在短暫的返歐旅行中，他建立了一所世界語言學院，招收學生，漢語教學也有成效；他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演講激起了民眾的一些興趣；此外，英國教會開始重視開拓中國傳教市場。馬禮遜在完成了這些事情後，他又回到中國。

馬禮遜對於中學西傳的另一大貢獻，也是最為人忽略的貢獻，就是他將大量自己收藏的中文書籍帶到英國。在西方國家的圖書館裡，漢學書籍對很多人來說相當陌生。四百五十年前，歷史記載的第一批漢學書籍就是同大象一起到達歐洲的。即使他們有一點中文收藏，也由於很少有人能閱讀中文，被雜亂地堆放著，並沒有現成的書目供人們使用。在馬禮遜之前，最大的一批中文書籍是由英國皇家學會通過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購買的，其中有一兩本中文辭典及其它一些較好的關於漢語語言的書。這些書應是在1765年運送的，在後來的十多年裡，英國又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一些中文書。這些藏書的數量沒有準確的數字，大約有兩、三百本，而中國1782年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列出的書目總數達10,254部書。在廣東的東印度公司從1806年開始建立了一個圖書館，收藏大約1,600本的英文、法文和中文書。這個圖書館在1832年被拆散了。公司僱員的私人收藏如小喬治·斯湯頓1824年捐給皇家亞洲學會（該學會在他幫助下建立）的藏書就有186本，一年後Fowler Hull捐獻了另一批書，奠定了

大英博物館中文藏書的基礎。曼寧收集的共兩百本中文書，最後也捐獻給了皇家亞洲學會。

而馬禮遜圖書館（現屬於倫敦亞非學院）作出的貢獻甚至大於皇家亞洲學會。馬禮遜得知小喬治斯坦東在倫敦創立了亞洲學會捐出自己的藏書，還致力於在學會內建立一個東方圖書館和博物館，馬禮遜積極回應，1824年抵達英國時帶回了上萬冊自己在中國購買和收藏的中文書籍，其中不乏珍品。馬禮遜要將這些圖書捐給英國的大學，供教授中文的教授和學生研究和學習。雖然這批書歷經了一些波折才被妥善安置，馬禮遜的慷慨捐助已使英國的中文收藏躍居歐洲前列。小喬治斯坦東後來還以擁有的馬禮遜藏書為條件，成功說服了倫敦大學設立了一個為期五年的漢學教授席位。1837年，英國第一位漢學教授接受了任命。英國的漢學研究憑藉着豐富的漢學書籍，也提昇到新的階段，馬禮遜的推動促進功不可沒。

以英華辭典為例看他的語言學成就和貢獻

馬禮遜的語言著作中最負盛名的就是漢英辭典了。法國耶穌會士所取得的成就已經無須證明，然而對馬禮遜，歐洲當時還有一些反對之議論，特別是來自德國漢學家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對他的抨擊。根據馬禮遜日記，這一大型工具書幾乎是馬禮遜個人完成的，協助他的還有兩、三個中國教師和幾個印刷工。作者來華後1807年才開始有成效地學習漢語、收集資料編寫辭典。辭典的前兩部早在1818年12月就已經完成。馬禮遜自己在辭典前言中提到他借鑒了先前的手抄本辭典，也反復提到了《康熙字典》。辭典這樣的大型工具書的編撰需要大量借鑒前人的成果，而英漢辭典是否是公務繁忙的馬禮遜原創的呢？他的中文水準與以前的天主教會士相比又如何呢？筆者對此也存在一定的疑惑，於是進行了一些研究，借此簡要地將我初步的研究結果總結一下，讓人們較具體深入地瞭解馬禮遜對中學西傳的貢獻。

馬禮遜學習漢語時曾經受益於 B. Brollo de Glemona 的手稿漢拉字典，這部辭典也被認為是代表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最高水準的一部辭典。巴黎 1813 年出版的《漢字西譯》(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則被公認是 B. Brollo de Glemona 手稿辭典稍加整理後的再版，De Guignes 除了將拉丁文的釋義譯成法語外，並沒有做太多的改動。我因為無法親見藏在意大利的手稿辭典，僅通過《漢辭西譯》(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來瞭解當時馬禮遜手邊最優秀的一部漢外辭典所具有的優點。這部辭典提供了音檢表檢索，並且給出對應的釋義和編號，這是漢外字典編撰的重大貢獻，但由於沒有給出注音對應的漢字，再加上當時注音方式又不統一，所以影響了音檢表的實用功能。此外，沒有漢字形式的例詞和例句也影響到使用者的語言學習。但這本辭典在漢外辭典的編排上已經接近當代辭典編撰的體系，並且有注音形式的例詞和例句，這些突出貢獻不能否認。

編撰漢外辭典一般都要借鑒中文的單語辭典以提供基礎。《康熙字典》也是馬禮遜在辭典前言中提及的辭典，並且代表了當時中國辭書編撰的最高成就。它收字廣泛，從古到今的漢字幾乎悉數收羅並加以註釋，同時提供大量書證。但它畢竟是一部供中國文人學習經典的單語辭典，中國文人都很難查閱，更不要提外國人了。如果查閱者知道這個字的寫法，而不知道是哪個部首的字，有可能在“檢字”中得到線索，而另一種可能就查找不到。因為“檢字”收錄疑難字，而非常用字，所以不知道部首就無法很好地使用這部辭典。此外，如果祇知道這個字的音，《康熙字典》沒有音檢系統，那也無法查找該字。對於外國人來說，在不明字音或知道字音不明字義的情況下很難在《康熙字典》中得到滿意的結果。

馬禮遜則深諳這些弊病，所以，在編撰辭典時總結了上述字典的優缺點，結合中國和西方不同的辭典編撰傳統的精華，同時也創新地解決了漢英辭

典的音檢問題，以彌補上述辭典之不足。馬禮遜在第一部辭典後做了一個“An Index of English Words”（英語索引，附有字典中對應的頁碼）。對於熟悉英語的人來說，查找漢字非常方便，而不需要先知道部首。馬禮遜的英文索引事實上比部首查字更方便有效。馬禮遜在《五車韻府》（第二部辭典的中文名字）的音序檢索使得根據漢字的發音在辭典中查找漢字和釋義成為可能。馬禮遜還考慮到當時沒有一個同一標準的注音系統，選擇了廣東話音和 B. Brollo de Glemona 的手稿辭典注音作為參照音，以建立在英語發音基礎上而不是拉丁語或其它外語的注音方法對應，這樣說英語的人或以前學習過廣東話的人都可以很快地類推出要查找的漢字注音，可以在辭典中查找漢字。《五車韻府》這本漢英辭典從檢索方式上來說是真正開創了現代漢英辭典編排體例的先河，在漢外字典編撰史上也是首次解決了漢語檢索難的問題。根據英語的意義檢索相應的漢字也是馬禮遜辭典檢索方式的一種，這些嘗試為後來漢外辭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馬禮遜的辭典釋義也極具特點的，不僅有漢字形式的短句還有完整的句子，所收的詞既有文言詞語和書面詞語，也有口語和俚語，有專名也有成語、諺語，辭典的英語釋義準確、細膩、重視文化傳統等。筆者隨機比較了一下馬禮遜辭典和康熙字典對“信”的解釋，結果發現：馬禮遜在辭典中所採用的例詞例句與《康熙字典》的書證相同的沒有一個，祇有對這個字的釋義參考了《康熙字典》的詞條。其中像“你們在西邊信鬼神否”、“我不信”這樣的口語對話體的句子都是馬禮遜與中國人交往中收集的一手語料，還有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乃人之本人若無信則言行皆妄、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都是收自《論語》的句子，其餘的片語等都是字典編撰者有意收集整理的非常實用的表達。這充份體現了馬禮遜的語言水準和辭典的創新性。即使在資訊技術發達的現在，這樣原創辭典也是少見的。因此，馬禮遜的辭

典遠遠超出了以前天主教傳教士所編撰的字典水準，在編寫體例上已經近似當代的辭典了。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再看看一百年後的知名漢英辭典如 1898 年和 1911 年的季理斐 (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 漢英辭典和 20 世紀初兩部漢英字典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1892, 1912)、馬修斯 (Robert Henry Matthews, 1877-1970) (1931, 1945) 的漢英辭典，他們所具有的優點如翟理斯的辭典的注音有方音，收字下面不僅有單字、短句還有完整句，所收的詞目有文言和書面詞語，有口語和俚俗詞語，有專名也有成語、諺語，字典的英語釋義準確、譯義細膩、重視文化傳統等，早在馬禮遜的辭典中都已经體現了上述優點。就連翟理斯辭典的缺點也與馬禮遜的辭典類似：收錄詞目無任何科學標準和系統性，複字條目的排序極其凌亂。由此可以反觀出馬禮遜辭典對後來漢英辭典的影響。在馬禮遜開了編撰並出版大型漢外工具書的先河後，大型漢外工具書紛紛湧現，漢外辭典異常繁榮起來。辭典是器唯新是用的工具書，所以馬禮遜的開創功勞已不被人所知，但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漢外辭典的編撰史上，這樣一部中西合璧的優秀辭書仍然有其自身的價值。

近年來國際語言學界開始注意到馬禮遜的辭典，並且借助辭典提供大量百科全書式的語言材料，進行中國漢語史、中國近代外來詞和音韻學的研究。如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 South Coblin 教授則借助馬禮遜漢英辭典的英文注音來研究清代中期官話，根據字典提供的資料做音韻學的研究。周振鶴教授在 1999 年 6 月 23 日《中華讀書報》上發表題為“善讀書者之一大助”的文章，從中英語言接觸的角度發掘馬禮遜字典的價值說：“為了出版這本書，由東印度公司資助了 12,000 英鎊之鉅，總共才印了六百部……老辭典保存晚清西方事物和概念的史料和語料，西方所無的風俗和文化如何在英語中體現及西洋事物如何漢語表現，都是值得研究的。”日

本的內田慶士教授、沈國威教授都在近代語言文化接觸角度對馬禮遜的辭典進行過研究並有相關著述。

馬禮遜的語言學著作極大地便利了外國人學習漢語，在他之後的新教傳教士秉承了馬禮遜語言學習與教學的傳統，新教傳教士在漢語學習、教材編寫、中文著書等各個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績。此外，在遠離中國的歐美方面，馬禮遜的辭典和其它著作促進了歐美學者的研究和學習，為歐美大學開設漢語教席起了促進和推動之功。

小 結

馬禮遜的語言成就和為推動語言所作的努力首先要歸功於他的宗教信仰和熱誠。他最初學習漢語的動力來源於傳教，目的也是為了傳教。然而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讓他很快認識到漢語和中國文化學習的重要性，因此自覺地承擔起推動漢語和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的使命。雖然馬禮遜生前在英國倫敦推動漢語學習和大學設立漢學教授的努力最終失敗了，英國漢學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高峰後直到現在都低迷不前的事實恰恰說明了馬禮遜的高瞻遠矚。而馬禮遜以英華辭典為代表的語言學著作經歷住了時間的考驗，在其近兩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因其很高的學術價值日益引起語言學界的重視。在宗教界和教會裡，馬禮遜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對於開拓新教在華事業的貢獻，而在語言學界，馬禮遜則因其英華辭典而不朽，對漢語史和漢外詞典編撰做出了貢獻。這兩者應該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加深對馬禮遜的理解，對他的評價才能更為客觀和公正。

【註】

- (1)(5) 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308-309；頁 234-235。
- (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7，頁 381。
- (3)(4) Samuel Kid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in two volumes, compiled by his widow;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London, 1839, p. 96; pp. 268-293.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誠，廣東南海人，1872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幼童出洋預備科，成為中國第一批官費留學生，1875年5月入美國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鐵路工程專業，以第一名獲學士學位。回國先後效力於福州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和廣東博學館，1888年入中國鐵路公司受命為京張鐵路會辦兼總工程師，創造獨特方法提前兩年完工，受到海內外的普遍贊譽。